

张謇广聘人才振兴南通医学事业

□吴晓芳

这台购买于1920年、被老百姓称为“神镜”的X光机,和德国医学博士夏德门一起留在黑白影像里,见证张謇办院的初心,成为医院发展的印迹。



1920年夏德门用X光机工作照,此图系患有心疾之人在院用爱克司光镜验病时所摄。

档案里的张謇
南通市档案馆主办

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进行了70天的参观学习。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惊叹不已,也深切感知到国家的发展与人才培养息息相关。“国待人之治,人待学而成”。张謇认识到,医学人才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母校的老师同时也是医院的医生,因此,师资的引进尤为重要。张謇以独特的视野和做法不拘一格广纳贤才,“采访本国散在各国大学毕业之学生,招致回国”,或“访已在各国学高等各科学者,助其学费,令人大学,分门学习,订立志愿书,学成回国,尽大学教员与助教之义务”。此举吸引了熊辅龙、沈尧阶、赵铸、李希贤等留学生和从国内医科大学毕业的的优秀学生投身于西医教育和西医诊疗中。从民国六年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教职员表中可以看到,张謇和张管分任名誉校长和校长之职,但他们分文不取,其高风亮节跃然纸上;而被他们从国内外聘请的一批名医,如沈尧阶、赵铸、李希贤等人均为每月100银元。沈尧阶是同

济工大学医科毕业,同时也担任南通医学院院长;赵铸和李希贤都从日本留学回来,被张謇延揽至医校和医院,除了教学之外,还分别担任医院外科主任和耳鼻喉科主任。从行政人员和基础课教员每月俸禄为6-40元不等这一点可以看出,张謇更加重视临床和有资历的专业授课教师。张謇爱才惜才,提出对人才要“优予俸给”,采用栽树种树、挖池塘养鱼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入。

除此之外,张謇还自己培养人才。方式有二,其一为选拔优秀人员留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一共五名,其中一名毕业生叫胡维芳,毕业后留校成为该校西医教员。其二为选派自己培养的优秀毕业生,资助他们到国外学习参观、进修深造。被张謇派到日本留学的熊辅龙绝不是个例。张謇所办医校中医班的首届毕业生瞿立衡,1921年从中医班毕业后,又学习西医四年,1925年在张謇、张管的支持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2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瞿立衡也始终心怀

桑梓,念念不忘张謇对他的培养之恩,学成回国后,担任张謇所办医校校长和医院院长,为医院发展殚精竭虑。1932年,瞿立衡担任医院院长,在张謇儿子张孝若的支持下,即刻着手对医院设备进行更新,添置了太阳灯及电气等理疗仪器,治疗疾病“颇有成效”,且“无论何时,均可开机。闻治疗方面,由瞿博士指导实行”。

此外,张謇坚持五湖四海、唯才是举,他认为“于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1920年张謇高薪聘请德国医学博士夏德门(Dred Schel Demann)来医院担任总院长。夏德门擅长外科,同时进行X光检查和诊断。为了迎接这个外国人,张謇又斥巨资购买江苏历史上第二台X光机,并新建一幢两层楼的X光机楼安放X光机。大生档案中,有一封1919年11月7日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吴霖尘给徐广镛的信函,记录南通医院置办的爱克司光镜(X光机)、医药用具、显微镜、煤油马达等均已运到南通,全部款项八元八角,4625两是通过大生驻沪事务所支付,账目已报张謇。张謇十分尊重这个外国人,一楼东边的房间放X光机,楼上作为夏德门的卧室和书房。放眼当时那个年代,全国有X光机的医院凤毛麟角,且大多为教会医院。张謇能有如

此胆识和眼光,为偏居一隅的南通医院采买如此高昂设备、引进国外专业人才,实在令人敬佩。

1920年5月《时报》刊登《南通县南通医院广告》,夏德门作为南通医院聘任的“总院长”,主持医院西医疗务。夏德门在南通医院的诊病时间为上午10点至12点,其间概不出诊,其挂号费和手术费根据南通医院的标准收取;同时还兼任医校教授。据瞿立衡回忆,夏德门来院后,施行外科手术,前来检查的病人络绎不绝。当时的《通海新报》报道,病人“均得美满之结果。有一乳腺肿瘤患者,多年苦痛不堪,经医院诊治,大行手术,数日即愈。又有患疝气大肠溃疡者,经剖腹割去烂肠,也很快治愈”。1920年7月,唐闸地区发生鼠疫,受张謇之命,医院在唐闸公园附近设立临时医院,并派遣两名医校毕业生驻守救治病患。夏德门每天到临时医院指导治疗,直到时疫解除。

这台购买于1920年、被老百姓称为“神镜”的X光机,和德国医学博士夏德门一起留在黑白影像里,见证张謇办院的初心,成为医院发展的印迹。而这台X光机也没有辜负张謇的苦心经营、巨额投入、坚守使命,直到193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十多年的岁月里,它为无数人的身体留下了清晰的影像、为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确切的依据,它和它的时代故事一起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30年前的银行储蓄利率

□程大和

相信多数人都要与银行打交道,除非一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没有一分钱贷款,也没有一张银行卡。现在的银行存款、贷款利率都比较高,但银行存款余额仍在暴增。那30年前的银行存款利率又是怎样的呢?近日,笔者看到一份某银行1993年下半年的“储蓄存款利率表”。看了这份当时的利率表,让人感到今天的银行存款利率与30年前真是天壤之别。

这份利率表表明,当时该银行的存款种类有七种,分别是: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本付息定期储蓄、零存整取定期储蓄、独生子女专项储蓄、定活两便储蓄、活期储蓄。众所周知,人们的储蓄正常都以“整存整取定期储蓄”为主。当时“整存整取定期储蓄”的利率又是多少呢?告诉你,当时整存整取的存期有七种,分别为: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利率为:三个月定期的月利率5.55%,折算成年利率6.6%;六个月定期的月利率7.50%,折算成年利率9.00%;一年定期的月利率9.15%,折算成年利率10.98%;二年定期的月利率9.75%,折算成年利率11.70%;三年定期的月利率10.20%,折算成年利率12.24%;五年定期的月利率11.55%,折算成年利率13.86%;八年定期的月利率14.25%,折算成年利率17.10%。按照此利率标准,每百元存款到期可得利息,三个月的为1.67元,六个月的为4.50元,一年的为10.98元,二年的为23.40元,三年的为36.72元,五年的为69.30元,八年的为136.80元。假如当时一万元存款一年可得利息:10000×10.98%×1=1098元。一万元存款八年可得利息:10000×17.10%×8=13680元。怎么样?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高得惊人吗?现阶段民间借贷年利率的上限也仅为15.4%(最新的LPR利率是年化3.85%,4倍也就是15.4%。超过15.4%的,法律不予保护)。而30年前银行定期八年的存款,其年利率就达到17.10%。这样的存款利率,既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据一些老银行人回忆,当时由于物价高涨,就是这么高的利率,老百姓也不愿存款,为了吸收存款,银行还开办了保值储蓄,就是在定期存款利息的基础上,再根据物价上涨指数,进行保值贴补。笔者长期在保险公司工作,对当年银行的保值储蓄与保险公司储蓄性保险的利差返回也有较深的印象。

史海回眸

粗茶淡饭树廉风

□海华

刘季平(1908—1987)是一名老党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江苏如皋双甸人(今属如东),原名刘焕宗,笔名满力涛等。刘季平先就学于如皋师范,参加“平民社”宣传马列主义,后又转学晓庄师范,出任中共晓庄师范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五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

张劲夫在《悼念刘季平同志》中,称赞刘季平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刘季平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一生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官树廉风,办实事。在他众多的事迹中,惯吃简餐作为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却很有教育意义。

早在革命年代,刘季平便已养成食用简餐的习惯。1942年冬,出版家、民主人士邹韬奋先生前往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刘季平时任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他是邹先生的故交,接到泰东县县长董希白的邀请,拜会邹韬奋。前后一个多月,他和邹韬奋同住、同吃、同行。所谓“同吃”就是食用他平日吃惯的粗茶淡饭。其间,偶然受到特殊招待,也就多一碟客菜,像炒鸡蛋。

20世纪60年代初,他前往山东工作,任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5月,毛泽东、李先念等人前往山东视察。刘季平曾陪同毛主席参观山东省科技馆。一方面工作繁忙,一方面又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短缺,刘季平仍坚持食用简餐。组织上分给他的物资或供应品,如一只鸡、几条鱼、一斤糖、几斤豆等。他从不领取,天天只吃蔬菜。他拒绝各种宴请、照顾。多年后,他的下属刘坚贞深深感慨老上司的饮食方式:“瓜菜代肉”。在忆文中,刘坚贞赞叹道:刘季平廉洁自律的精神带动了全省干部,也激励了人民群众。

刘季平还要求子女也不讲究吃穿。这在他的家书中充分体现。1964年11月10日,刘季平写信给夫人吴瀚,述及自己近期将去上海、越南,需要在外工作多日。这段时间,他希望家人平时在食堂吃饭,星期天才可以回家做饭。20世纪70年代,他的四子刘宁下放农村,颇感生活困苦。1972年元旦,他去信刘宁:

你一到那里就感到没有小菜吃的困难,连信封和邮票也没有……有一句老话,叫做“好吃懒做”。你过去有时还好,有时也有这种情况。现在你已经不小了。又进一步开始走进社会了,这些毛病不坚决改掉,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好吃懒做”是刘季平老人家常说的一个词语。他用这接地气的俗语,教育孩子不追求物质生活,应当多做实事为社会服务。在刘季平的要求下,艰苦朴素成为刘家的家风。无论为官,还是为父,刘季平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都值得后代传承学习。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抗战故事

众所周知,新四军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一般都是以自然顺序命名的,如“一师、二旅、三排”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以地名或人名命名(如临汾旅、左权独立营等)。但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里也曾有一个特殊的旅,是以地名命名的,这个旅就是“崇启海常备旅”。

一、组建“崇总”

1938年3月日寇占领崇明县城,国民党军队早已闻风而逃,国民党崇明县政府也逃离了崇明。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推动崇明地区的抗日斗争,江苏省委派共产党员茅理(时茅理公开身份为“国民党通崇海启四县抗敌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瞿理等人从海门、启东崇明来领导崇明的抗日武装斗争。茅理、瞿理来到崇明后,迅速把分散在崇明各地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组成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根据当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国民党崇明县长陈廉尧(时陈廉尧在江北海门的倪家镇)为挂名总队长,茅理为副总队长,瞿理为参谋长。1939年8月6日,茅理率“崇总”一大队埋伏在附近伏击了两辆日军军车,毙敌十二人,伤敌八人,这是“崇总”组建后取得的第一胜利。8月16日,茅理又亲率三个中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崇明西部残害抗日武装战士的土匪部队,营救被抓捕的抗日战士,受到抗日民众的一致称赞。

为解决崇总武器不足的问题,在茅理指挥下“崇总”袭击了由大汉奸倪耀全指挥的伪警察所,缴获步枪23支,短枪一支;随后崇总各大队也都纷纷行动,从

敌人手中夺得了一批武器,武装了自己。此后又在小竖河战斗、堡镇码头袭击战等战斗中,毙敌日军数十人,伪军上百人。“崇总”还在敌人控制的堡镇纱厂清花间炸毁机器,在大港桥炸死炸伤日军二十八名。茅理指挥“崇总”越战越勇,使崇明的日伪军惶恐不安。

1940年6月8日,崇明日军调集军舰炮击“崇总”根据地。敌酋石乔在出发前曾大吹“要活捉茅理!”但茅理沉着应对,积极反制敌人的进攻,他们挖出未爆的炸弹,改装成地雷,以其之矛还治其人之身。

二、北撤桃源镇

敌人对“崇总”的活动恨之入骨,驻上海的日军准备调集部队对崇明进行大“扫荡”,围剿“崇总”。我方探到这个消息后,江苏省委认为崇明岛南北不过七八里,东西不过百里上下,不利于大部队迂回作战。省委命令“崇总”分批、分散先北撤至江北。1940年6月底第一批北撤人员分别装扮成旅客、小贩或乘小船北撤。尽管这样但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敌人加强了对江面的封锁和往来人员的检查,特别严查武器弹药的夹带。

1940年7月30日起,驻上海的日军调集了7000多兵力对崇明实行梳篦式“扫荡”,他们一路烧杀抢掠,扬言要消灭“崇总”。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崇明。此时县工委书记和“崇总”部分人员还未来得及撤离,特别是武器弹药大部分还未运走。县工委研究决定由陈国权、韩念龙等留崇领导敌后斗争,茅理全面负责江北方面的工作。

茅理到江北后,物色了几条可靠的船只,以到崇明装灰肥为名,偷偷将机枪、步枪、子弹等藏在灰肥里,惊险的躲过了敌人在崇明装船时的检查,往海门牛洪港方向开去,但是由于海上遇到日本巡逻船的检

查,为躲开敌人的检查而调转了方向,船漂到了江南。后经几番周折才开到了海门牛洪港,但离约定的时间过了整整2天,港口已没有化装成钓鱼的接应人,船老大的妻子是个机灵人,她去桃源镇找到了“崇总”人员,终于把枪支弹药顺利发到了“崇总”战士的手中。当战士们拿到渴望已久的枪支时心情是多么的激动。

三、“茅理旅”诞生

茅理,又名茅理,海门县桃源镇(今海门区三星镇宝兴村)人。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茅理到海门后,以他的家乡为根据地,迅速将撤离在海门、启东一带的“崇总”战士集中起来,同时他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鼓励思想先进的青年加入部队。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部队发展到500余人。对于这支部队的定名,如继续沿用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之名,不仅部队已不在崇明,且其今后的斗争任务也主要不是在崇明,所以用“崇总”之名不太适合。因此有人主张用“通崇海启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因为当时茅理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通崇海启四县抗敌指挥部负责人,但对于挂国民党的牌子,大家都不愿意。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新四军的队伍,希望挂新四军番号的正统部队,但这也由新四军批准。

1940年10月,在黄桥战役取得胜利后,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决定处理地方问题(包括茅理所部的定名问题),不久茅理、韩念龙接到了由中共南通中心县委转来的通知,要他们二人去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受任务,两人化装成棉花贩子,通过敌占区,来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向陈毅汇报了工作。在谈到部队的定名时,因为当时仍处在国共合作阶段,所以陈毅说了有利于统战工作,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制造

崇启海常备旅诞生记

□李元冲

反共借口,决定部队仍不用新四军番号,部队内党的组织也暂不公开。鉴于那时国民党许多县的所谓“抗日游击总部”已陆续改名为保安旅,因此这支部队也可以是“旅”级建制,作为苏中军区4分区(司令员陶勇)领导和指挥的机动部队。茅、韩回到总队部后,立即向陶勇司令员和中共南通中心县委汇报,于是将这支部队正式定名为“崇启海常备旅”。10月底,崇启海常备旅在启东东隆镇正式成立。由于这支部队骁勇善战,军纪严明,百姓称之为“茅理部队”(又称茅理旅)。旅长茅理,副旅长王澄,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参谋长廖昌金。下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营,成为活动在崇明、启东、海门和苏北大地上的一支新四军的重要机动力量。

1940年12月,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趁陶勇奉命带领部队离开掘港去参加曹甸战役的时机,命令驻扎在南通县石港镇的国民党抗日游击总队第三路第六纵队司令员徐承德进攻掘港。于是徐承德于12月27日拂晓集结了5000多兵力,向我掘港的新四军总部发动进攻。实际上陶勇在离开掘港前就早有部署,已调崇启海常备旅和驻在海启地区的新四军3纵5团到掘港护卫以防不测,徐承德怎么也没有想到陶勇会布置这样一手棋,直到攻城三天三夜未果后,才发现自己上当,但为时已晚。这时陶勇又挥师南下,两面夹击,徐承德落荒而逃,几乎全军覆没。

掘港保卫战后,鉴于李方领导的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已成立,所以崇启海常备旅奉命与新四军3纵5团合编后,仍保留抗战形式,挂名在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名下,改名为“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又称茅三旅),旅长茅理,政委李干辉,政治部主任韩念龙。部队驻地也由海门桃源镇移至掘港。正式存在了2个月的崇启海常备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光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